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红军长征

综 述
大事记
表 册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解放军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红 军 长 征

综 述
大 事 记
表 册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1989 ·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红军长征

综述

大事记

表册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邮政编码100035)

新华书店经销

1201 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16开本19印张330千字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

ISBN 7-5065-0864-8/K·76

定价: 8.50元

《红军长征》编审委员会

主 任 杨得志

副 主 任 宋时轮 秦基伟 颜金生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李怀德 宋时轮 杨得志

周 村 莫 阳 秦兴汉

秦基伟 谢有法 颜金生

《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编辑组

组 长 仲兆良

编 辑 (以姓氏笔划为序)

张光彩 雷光鸿

《红军长征·表册》编辑组

组 长 郝宏涛

编 辑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健英 刘云峰 林华明 郭立昌

总 序

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到今天，已度过了60多个春秋。这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军队，在夺取政权和保卫政权的斗争中，从胜利走向胜利，不断成长壮大，在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道路上奋勇前进，已成为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钢铁长城，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这支人民军队积累了丰富的建军与作战经验，形成了自己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军事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无数革命先烈、人民军队广大官兵和亿万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人民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杰出领导人和无数革命先烈，对人民革命武装斗争的伟大功勋和建树，将永垂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史册。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多年来，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历史资料。过去对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缺乏全面、系统的整理，影响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的研究和宣传。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编纂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力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全面、完整、系统、准确地汇集人民解放军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重要战役、战斗和军队建设中重大问题重大事件的历史资料，并对重要史料认真进行考证和核实。这套丛书的出版，将为研究和宣传人民解放军的历史，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国防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的依据；也为向军队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光荣传统教育提供重要参考资料。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分若干卷，每卷分别由综述、文

献、回忆史料、大事记、表册、图片等部分组成。中共中央军委批准由周克玉、徐信、刘明璞、姜思毅、钱抵千、邵华泽、程建宁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在中央军委领导下，统一组织领导全军历史资料丛书的编审工作。许多身经百战的高级将领亲自主持编纂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区、军兵种和国防科工委、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等单位，领导和参加了有关卷册的编审工作。这套丛书还得到了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与配合，一些中共党史、军史工作者、专家协助审阅了部分书稿。选编不当和疏漏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修订。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1989年3月

前 言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是一部惊心动魄、气壮山河的光辉史诗。《红军长征》史料丛书以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反映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历史过程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为全面地反映红军长征这段历史的真实面目,在编纂工作中,我们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存真求实的原则,对历史档案和回忆史料认真考证,力求准确无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由于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对红军长征没有统一的部署,各部红军长征开始与结束的时间亦不相同,因此,《红军长征》采取按单位、分专题叙述的体例。在内容上,既反映红军领导者高超的指挥艺术,也反映广大红军指战员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既反映红军的胜利和成功,也反映挫折和失误。在重点反映红军行军作战的同时,还适当反映统一战线、民族政策、根据地和军队建设等方面的情况。

全卷书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综述、大事记和表册。综述是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史作综合性叙述;大事记是以时间为顺序,记录长征中发生的重大事件;表册则以表格的形式反映红军长征中的组织序列,团以上干部名册,师以上部队主要战役、战斗战绩统计和营以上英烈名录等。第二部分为历史文献,选编有关红军长征的重要历史文件、电报、信函等文献资料。第三部分为回忆史料,选收了原红军团以上领导人撰写的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回忆文章。第四部分为图片,收集了红军长征中重要战役、战斗要图和长征各阶段形势图,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人物、

文物照片等。第五部分为参考资料,选编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的历史文电和国民党军的一些指挥官的回忆文章。

《红军长征》史料丛书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后勤学院、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陆军指挥学院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共同编纂。在编纂过程中,广州军区、成都军区、兰州军区以及河南省军区曾参加部分资料整理工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总参谋部调研室,红二、红四方面军战史修改组,国家地图出版社、档案出版社以及有关省、市、地区档案馆和党史研究单位,在提供资料、审查书稿等方面,给予热忱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中央军委史料丛书审查小组姜思毅、李曼村、李希庚、邵华泽、刘振杰、祝庭勋、沈宗洪、段浩然、阮家新、刘玉润审阅了本册综述部分。

《红军长征》编审委员会

目 录

综 述

引 言	(3)
一 红六军团西征揭开红军长征的序幕	(7)
向湖南中部转移	(7)
与红三军会师向湘西发展	(9)
二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12)
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	(12)
黎平会议端正进军方向	(18)
三 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	(22)
离开鄂豫皖挺进陕南	(22)
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24)
四 中央红军转战川滇黔边	(27)
遵义会议	(27)
四渡赤水 威逼贵阳	(29)
进军云南 巧渡金沙江	(37)
五 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	(41)
嘉陵江战役	(41)
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	(43)
六 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北上	(45)
中央红军通过彝族区	(45)
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	(47)
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	(48)
党中央同张国焘在战略方针上的斗争	(49)
红一、红四方面军北上	(53)

七 西北红军的反“围剿”斗争和红十五军团成立	(56)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56)
红二十五军与西北红军会师	(57)
八 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到达陕甘	(60)
张国焘擅令右路军南下	(60)
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	(61)
陕甘支队同红十五军团会师	(65)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	(66)
巩固扩大陕甘苏区	(67)
九 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	(71)
绥崇丹懋战役	(71)
天芦名雅邛大战役	(72)
南下部队西进甘孜	(74)
十 红二、红六军团长征	(76)
向湘黔边转移	(76)
转战湘黔滇	(78)
北上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	(80)
十一 红二、红四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会师	(82)
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甘南	(82)
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84)
结束语	(89)

大 事 记

一九三四年	(99)
一九三五年	(112)
一九三六年	(142)

表 册

一 红军长征时期组织序列	
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组织序列	(165)
红军第二、第六军团(第二方面军)组织序列	(171)

红军第四方面军组织序列	(174)
红军第二十五军组织序列	(183)
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时的组织序列	(185)
二 团以上干部名册	(193)
三 红军长征期间师以上部队主要战役、战斗战绩统计	(247)
四 红军长征期间实力统计	
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实力统计	(267)
红军第二、第六军团(第二方面军)实力统计	(267)
红军第四方面军实力统计	(268)
红军第二十五军实力统计	(268)
五 营以上干部英烈名录	(271)
六 英模名录	(291)

综 述

引 言

举世闻名的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不畏艰险，前仆后继的英雄气概谱写的团结战斗的光辉史诗，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奇迹。这次长征，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加紧侵略，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的总形势下进行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内以王明（即陈绍禹）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实行错误的战略指导，使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的第5次“围剿”，中央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向湘西转移。随之，除陕甘苏区的红军外，各苏区的红军主力也先后退出原来的苏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回顾长征曲折的光辉历程，总结红军长征的历史经验，对于了解中国革命，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继承与发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优良传统，对于实现四个现代化，把中国建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进行了血腥屠杀和残酷镇压。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于8月1日领导一部分国民革命军举行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按照这一方针，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和领导了包括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在内的近百次不同规模的武装起义，并先后建立了数十支红军和游击队，在10多个省的广大地区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新时期。到1930年下半年，经过3年的艰苦奋战，各地红军和游击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紧紧地依靠革命群众，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了国民党军连续发动的“进剿”、“会剿”，消灭国民党军7万多人，创建了湘赣边、赣南、闽西和湘鄂西、鄂豫皖等10多个苏区。红军发展到3个军团10多个军，共7万余人。

革命力量的增长，震撼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1930年10月，蒋介石在结束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军阀混战后，迅速调转兵力，向红军和各苏区发动大规模的“围剿”，并把重点置于红1方面军和赣南、闽西苏区（统称中央苏区）。毛

泽东、朱德等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1、第2、第3次“围剿”，巩固和扩大了苏区。湘鄂西、鄂豫皖和其他各苏区的红军，也采取灵活的战术，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到1931年底，全国红军发展到拥有第1、第4两个方面军、10多个军共约15万人的主力部队和大量地方武装，苏区也得到进一步巩固和较大的发展。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的沈阳等地发动进攻，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3省不到4个月就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许多大中城市的工人、学生，多次举行罢工、罢课和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妥协，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在中国共产党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开始改变其依附于大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许多民族工商业者还参加了抵制日货等爱国活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开始分化，国民党军中，也有人主张抗日，部分国民党军队曾先后在东北、华北和上海等地有过对日作战的实际行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发展。

在全国革命形势顺利发展的情况下，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党的中央。他们不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不相信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曲折性，忽视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的客观形势和中间阶级的抗日要求，断言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主张“打倒一切”。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不相信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过分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地实行武装工农、各行各业总罢工等冒险主张。他们排斥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全盘否定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并被实践一再证明是正确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反对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主张打正规战、阵地战，反对打游击战或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他们这种错误的路线方针，使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遭到了严重损失。

1933年9月，国民党政府在蒋介石集团控制下，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集中100万人的兵力对红军和苏区发动第5次“围剿”，进攻的重点在中央苏区，总兵力有50万人。蒋介石鉴于前几次“围剿”的失败，

改变了以往“速战速决”、“分进合击”等战略，采取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所谓新战略，企图逐步紧缩中央苏区，不断消耗中央红军（即红1方面军）的有生力量，最后围歼红军主力于苏区之内。

面对这种严重情况，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否定红军取得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诱敌深入的方针和集中兵力、运动歼敌等作战原则，不仅不进行反“围剿”的准备，而且命令中央红军主力继续在江西、福建分兵作战，实行所谓“两个拳头打人”，9月下旬，在国民党军的“围剿”开始后，又继续采取冒险主义的方针，命令红军向国民党军控制的堡垒地区进攻，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在这种错误方针指导下，中央红军近两个月的英勇作战，不仅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反使自己陷入被动地位。

1933年11月，驻福建的国民党第19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领导下，公开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决裂，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表示愿意同红军合作，反蒋抗日。蒋介石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军队中抽调9个师，从沪杭宁地区抽调两个师，去进攻19路军，暂时减轻了中央苏区的压力。毛泽东曾建议中央红军改变战略方针，以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威胁国民党政府的根本重地，调动“围剿”苏区的国民党军回援，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战机，消灭其有生力量，以打破其“围剿”，并援助福建革命政府。但是，中共临时中央^{〔1〕}没有采纳这一正确的建议，以致失去了粉碎国民党军“围剿”的有利时机。

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后，重新集中兵力进攻中央苏区。这时，中共中央^{〔2〕}又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命令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实行阵地战、堡垒战、“短促突击”，企图以此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在中共中央错误方针指导下，红军虽然进行了许多次英勇顽强的战役战斗，但是没有阻止住敌军的前进。

7月初，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域开始全面进攻。中共中央为了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以中央红军第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深入敌后，到闽浙皖赣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根据地。7月上旬，北上抗日先遣队由瑞金出发北上，转战闽东、闽北、浙西和皖赣边，宣传了抗日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但未能达到大量调动国民党军，减轻中央苏区压力的目的。7

〔1〕 1931年6月，中共中央机关遭到破坏。9月下旬在上海成立了以博古（即秦邦宪）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通称临时中央。

〔2〕 1934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五中全会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博古任总书记。临时中央结束。